

哲学公案：海德格尔与纳粹

北京大学哲学系 赵敦华

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段公案。二战后德国“全国政治清查委员会”把海德格尔定性为纳粹的“同路人”，禁止他授课。由于弗赖堡大学申诉，海德格尔从1951年开始可以用荣休教授身份授课。1976年海德格尔逝世后几天，《明镜》周刊发表了十年前对他的采访，舆论界对海德格尔在采访中不思悔改的态度表示不满，但一般人认为，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只是萍水相逢，不必认真看待。然而，十年后智利人法里亚斯写了《海德格尔与纳粹》一书，有理有据地说明海德格尔哲学与纳粹思想有必然联系。这本书从西班牙文翻译为法文后，法国各大报用显著篇幅报道，《世界报》的标题是“这本书是颗炸弹！”，《解放报》的标题是“Hi，希特勒！”，广播电视也发表采访评论，德法哲学界名人参与讨论，其热烈程度远远超过讨论一个哲学问题。

法里亚斯的基本论点是，海德格尔一生都在实践纳粹主义，这种广义的纳粹主义是指起源于德国狭隘民族主义、反犹主义的保守意识形态。海德格尔在德国南部的中世纪文化气氛中接受神学教育，形成了反对现代主义和科技进步的世界观，乃至最后认同希特勒领导的“德意志革命”，这是一条符合逻辑的思想发展路径。历史学家奥托虽然指出海德格尔早在1919年就与天主教断绝了关系，认为法里亚斯强调海德格尔思想的天主教背景的方法占不住脚，但他用更多史料揭露了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密切关系。

一些哲学家不能接受法里亚斯的观点。比如，海德格尔的忠实学生伽达默尔的评论是“浅薄与无知”，他认为海德格尔参与政治犹如柏拉图教育西西里岛独裁者的失败经历。海德格尔的儿子辩解说，海德格尔1933年校长就职演说中根本没有出现“国家社会主义”、“元首”、“希特勒”等字眼，而是一篇学术性很强、政治性隐晦的文稿。德里达说，问题的要害在于海德格尔对纳粹大屠杀保持沉默，如果他能公开谴责奥斯维辛的罪行，那么一切争论就会消解。他认为“海德格尔的文本（行动和写作）与所有纳粹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有着深刻的关系”，但“所有纳粹”包含着“西方民主”、“美国生活方式”和无论何种形式的“世界秩序”。费尔根在《快报》的一篇文章中更明确地把“海德格尔之争”归结为民主与反民主之争，他赞赏海德格尔反对美国民主所代表的技术主义和世界霸权，并认同海德格尔关于从现代技术—民主社会返回素朴的社团生活的主张。这说出了海德格尔主义至今仍有广泛影响的原因所在。

从哲学与政治的关系看，胡塞尔对政治过于麻木，而海德格尔对政治过于敏感。海德格尔在当胡塞尔助教时，就在课堂上不点名地批判胡塞尔思想中“理论性的全面、主要宰制”，主张返回我们首先生存的原初世界和生活经验的原初习惯。纳粹兴起之后，他以为恢复威廉王朝继承的神圣罗马帝国精神传统以反抗全球技术蔓延的时机已到，在课堂上赞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反对“虚无主义”的努力。

哈贝马斯在为法里亚斯著作德文版所写的前言里，分析了海德格尔思想在1929年左右经历重大转变。在此之前，他基本上不参与现实的政治生活，《存在与时间》与后来的政治立场并无必然联系。但海德格尔在这一时期接受了一战之后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流行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其特征有“对学术界精英式的自我理解，对精神的神化崇拜，以母语的偶像崇拜，对社会大众文化的鄙视，完全缺乏已在法国和美国发展成熟的社会学方法，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两极分化，等等”。这种意识形态构成了《存在与时间》的文化背景。1929年之后，海德格尔对哲学家的使命有了一种非职业化、非学术化的理解，积极投入纳粹政治。比如，他在哲学上谈论“世界命运”、

“德国人民的此在”、“德国命运的引导者和护卫者”。哈贝马斯在海德格尔 1935—1945 年著述中找出与纳粹政治相关的三条线索：第一，通过批判形而上学史批判理性，否定现代文明成果（即海德格尔所说的“技术”）；第二，把德意志视为古代希腊的唯一继承者，表达德国人是“所有民族中心”的民族主义；第三，对纳粹主义的实质作了肯定性评价，认为它包含着“内在的真理”，只是其外在表现被错误的哲学和现代“技术”引入歧途。哈贝马斯说，海德格尔战后著作中仍用不同概念表达同样的意思：人民的“此在空间”变为“家园”，德意志民族主义转变成德语是古希腊语的唯一合法继承者的语言观。由于海德格尔战后思想并无实质性变化，他始终保持拒不谴责纳粹又不为自己过去的纳粹言行承担责任的固执态度。世人对他这一态度的恼怒或认可，具有文化保守主义与启蒙理性主义之争的政治背景。海德格尔的“粉丝”值得以此为鉴。